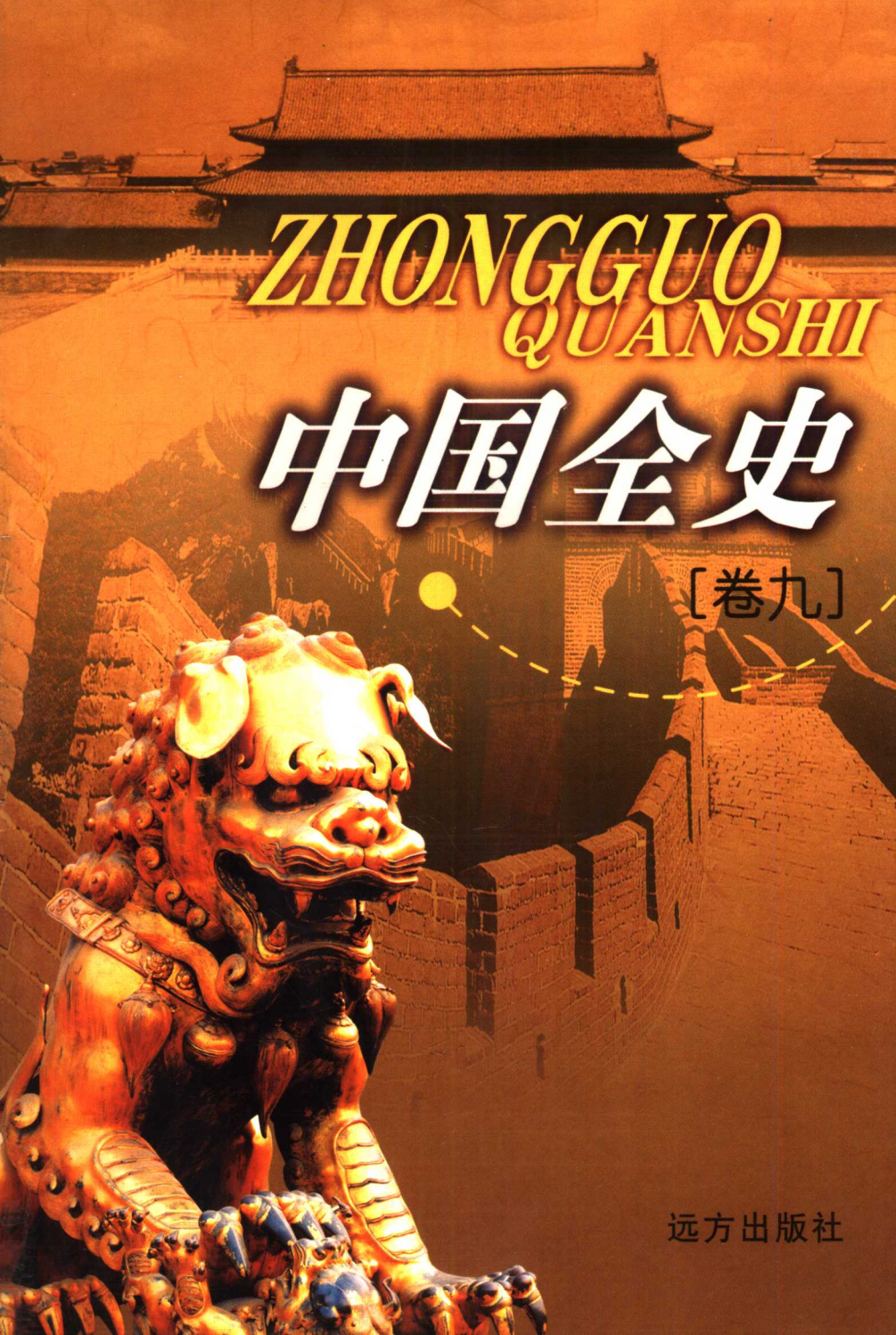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 golden-orange hue. In the upper por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of the Great Wall is visible,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tiered roofs and crenellations. In the lower-left foreground, a large, intricately carved stone lion statue (shishi) is depicted, facing right. The lion has a detailed mane and is adorned with a collar. A dashed yellow line with a small yellow circle at its end curve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 passing behind the title.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九]

远方出版社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通史 卷九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通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595-975-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锐意图治

(一) 安定内政

蒙哥汗既是在“三岁无君”、朝政紊乱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因此，即位以后，摆在他面前的紧迫任务，必然是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以便“改更庶政”，稳定局势。

为了把全国权力确保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首先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委托给他的兄弟忽必烈。蒙哥的诏命是：“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世祖（忽必烈）总之。”忽必烈既受命，“遂南驻爪忽都之地”，“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按：赤老温山，即今河北赤城县北的独石口，为外长城南北的交通隘口。为了总领长城以南的汉地军民大事，忽必烈遂由和林南迁至金北边部族所住的诸柵之地（“爪忽都”即蒙古语诸柵之地），并在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滦河上流）之地的金莲川（金曾修行宫于此，原名曷里浒东川，因产金莲花而名）设置幕府。忽必烈接到诏命后喜出望外，摆宴庆贺。谋臣姚枢及时提醒他：漠南汉地的人民和财富冠于蒙古国的各个地区，现在军民都归你管，如果有人从中离间，大汗必然后悔并将全部大权收回，“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后来，忽必烈采纳这一建议，只管漠南汉地的蒙古、汉军，汉地的民刑、财政则仍属燕京行省管辖。

忽必烈所受命的这一重任，自太祖时即交与大将、国王木华黎承担。木华黎死，子孛鲁继任。孛鲁死，其子塔思继任。塔思于太宗己亥岁（1239年）死，其弟速浑察袭爵。速浑察在太宗朝

颇受宠信，“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总中都行省蒙古、汉军。凡他行省监镇事，必先白之，定其可否，而后上闻”。后来，速浑察“寻薨”。漠南汉地的军事归忽必烈总领后，木华黎后裔虽在名义上仍袭领国王爵位，但在职权上则仅限管理札刺亦儿本部军。有的论者据此认为，忽必烈之任命总领漠南军事，与速浑察之“寻薨”是耐人寻味的，说不定这其中掩盖了“一件大事”，即：就像蒙哥遣亲信诛杀其他政敌一样，他之命忽必烈主持漠南军事，也很可能会命忽必烈除掉速浑察取而代之。

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蒙哥将一些有拥立之功的将帅大臣安排在汗廷的重要岗位上。例如：忙哥撒儿在拥立蒙哥和平定“三王叛变”事件中，功勋卓著，蒙哥即位后，首先任命他为大断事官，宠信有加。“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人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当时为了防反侧，“遏乱略”，蒙哥不得不重用这个既有拥立之功，而又执法不阿的“肃将大旅”；及大位已固，且鉴于忙哥撒儿“多所杀戮”，“咸腾谤言”，为了安定人心，他又顺势将其调为万户，改以哈丹任之。另一个与忙哥撒儿“密赞谋议”的李鲁欢，本来就出身于必闾赤长之后，蒙哥即位后，他得以“掌宣发言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又“掌必闾赤，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由此，李鲁欢“拜中书右丞相，遂专国政”，其地位与宠信不下于大断事官忙哥撒儿。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在当时的汗廷中，李鲁欢是必闾赤的首长和领袖，是他们的宰相。他像一个总管一样，处理所通报的诉状。为了协同他工作，皇帝还任命了穆斯林的必闾赤做他的助手，随同供职的还有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吐蕃文、唐兀文等等的各族书记。由此可见，蒙哥时随着新征服地区的增加，中书省在汗廷的组织机构更加扩大了，分工也更加细

密了。有的论者据此认为，这一变化不仅有利于削弱蒙古贵族的权力，提高君权，而且也意味着对先进的汉族封建制度的接受。为了克服窝阔台系统治时“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蒙哥汗身体力行，处理政务，事必躬亲。“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与此同时，蒙哥还任命了一些官员来掌管汗廷的其他职事。如以晃兀儿留守和林宫阙、帑藏，阿蓝答儿副之，后又以帖哥拙、阔阔术等掌帑藏，以孛阑合剌孙掌斡脱（经营高利贷的官商）；阿忽察掌祭祀、医巫、卜筮，阿刺不花副之；以只儿斡带掌传驿所需；以僧海云掌释教事，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等等。

此外，蒙哥还任命了地方政务官员。太宗时，蒙古汗国在国内共设立了三大行省，作为分别统治中原和西域的三个最高的政务机关。蒙哥即位后，任命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覲答儿为燕京行省长官，赛典赤、匿答马丁佐之；任命讷怀、塔刺海、麻速忽等为别失八里行省长官，暗都刺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任命阿儿浑为阿母河行省长官，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上述三个行省的官员，大多是窝阔台晚期以来，直至贵由汗时代就在该地主管财赋的旧班底。蒙哥即位后，为了稳定地方局势，故又重新予以任命。

燕京行省是自太宗时起就成为主管中原汉地财赋、刑政的最高政务机关。蒙哥即位后，令断事官牙刺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个盗马的人，已经判过杖刑，恰逢有人献刀，便又把他抓回来试刀。牙刺瓦赤等人又倡言在中原常赋之外，每户还要收银六两，谓之“包垛银”。一时间，“诸道长吏有辄请试用于民者”。后来，由于汉地官员的力争，才减去三分之一，改征四两。由于当时蒙哥坐镇漠

北本土发号施令，治理中原汉地民政、财政、司法的权力掌握在昔日一帮旧臣手中，他们专制一方，鱼肉百姓，继续贪赃枉法，搜括百姓，中饱私囊，使得中原积弊日甚，使国家失去了一次“致治之机”，这可以说是蒙哥在用法和用人政策上的一大错误。

蒙哥登基伊始，也还是颇有一番革除积弊，更新庶政的势头。针对定宗朝以来庶政的混乱，他曾“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敛民财；民粮远输者，许于近仓输之”。“既而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但是，由于这些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治标措施，并没有在促进蒙古征服者适应中原封建文明上有何重大的实质性的建树，因此，其成效必然是十分有限的。

（二）出征四方

当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掌握蒙古帝国重兵的拖雷系的长子蒙哥手中的时候，帝国的对外军事扩张倾向注定要增强起来。在蒙古诸汗中，蒙哥是继太祖、太宗之后，又一个推进疆域扩张政策的大汗。蒙哥即位时，正是一位“青春鼎盛”的“青年”。即位前，他有过总戎机，征讨钦察、斡罗思诸国的经历，和亲手擒获过钦察首领八赤蛮和阿速诸部落首领的显赫战功。皇族政治斗争中的辉煌胜利，登基后除旧布新的非凡气势，为他肩负开拓新疆的大汗使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他即位后，迅即雄心勃勃，决心要建立起超越其父、祖辈的宏伟业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蒙哥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对外扩张计划，仅在1251年夏至。1253年颁布的出征命令即有：以茶寒（察

军)、叶了干(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以带答儿(太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以和里角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命皇弟忽必烈征大理,命塔塔儿带撒里征身毒(印度)、怯失迷儿(克什米尔),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没里奚(木剌夷)、西域哈里发等国,命诸王也古征高丽等等。

现将已经见诸实行的扩张行动及其后果,扼要概述于下:

1. 东征高丽

在定宗贵由汗和宪宗蒙哥汗时,高丽人民继续以江华岛为据点,奋起反对蒙古的侵略和统治。蒙古统治阶级借口高丽“岁贡不入”,“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1253年,蒙哥罢也古征高丽兵,改命宗王耶虎率军侵入高丽,攻下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1254年,又命札剌儿台军攻掠高丽,“所掳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县,皆为煨烬”。这次侵略,给高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1259年高丽国王暭被迫答应将都城从江华岛迁回王京(今开城),并遣其世子偁到中国朝觐,以建立对蒙古的臣属关系。

2. 西征西亚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通过两次西征,已相继征服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蒙哥即位后,又立阿母河等处行省统一管理波斯各州民政。但是,当时波斯尚存两个独立区域,一直没有降附蒙古。一个是据有若干坚固要塞的“木剌夷”;另一个是以报达(巴格达)为都城的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回教共主哈里发。为了征讨这两个区域,蒙哥命皇弟旭烈兀为这次西征军的统帅,以乃蛮人怯的不花为前锋,西征军由诸王从所属军队中每十人签调二人组成。这次西征,是继成吉思汗和拔都之后,又一次席卷西方的巨大的军事浪潮。1256年,旭烈兀率军渡阿母河,进入波

斯境内，怯的不花已先拔木刺夷数堡。按：木刺夷为阿拉伯语“迷途者”，被伊斯兰教视为异端邪派，其徒惯于阴谋行刺，凶悍无道，常于“里海西南山内险隘处筑堡以居”。惟吉儿都苦堡（里海南偏东之山上），久攻不下，旭烈兀至，木刺夷王兀克乃丁迁延不从，旭烈兀分兵急攻，十一月二十日，主堡阿刺模提降，木刺夷平，蒙古军诛之无噍类。接着，旭烈兀率军进攻报达。按：报达位于波斯湾西北，为伊斯兰教圣城，哈里发的国都。当时的哈里发为木司塔辛。旭烈兀先以书招降，木司塔辛回答不逊，反指责旭烈兀“少年偶然得志，便藐视天下”。旭烈兀决计深入，三道并进，合围报达城。1258年2月20日，木司塔辛自知不支，遣使出降。报达城破后，哈里发及其长子被处死，阿拔斯朝第三十七代至此国亡。由是，旭烈兀遣使报捷，蒙哥决定把阿母河以外地区交由他统治。旭烈兀继遣将西征叙利亚和埃及。不久，西征埃及的蒙古军遭败，这时又传来蒙哥汗死于四川，以及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旭烈兀放弃返回蒙古本土的打算，决定乘机立足波斯谋求独立发展。这样，旭烈兀经营善后，又在波斯创立了一个新的蒙古汗国，这就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

3. 统一西藏

自太宗朝派兵深入吐蕃腹地，乌斯藏各教派与地方势力分别派人与蒙古诸王结成福田与施主的关系后，这一地区教派林立，互不统属的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变。为了确保汗廷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蒙哥于1252年在对中原实行编籍户口和分封宗亲的同时，也对斯乌藏地区进行了清查户口和划定地界的工作。据萨迦派新教主八思巴写给涅塘寺的堪布乞刺思八桑哥的信证实，蒙哥为了推进这次括户工作，曾宣谕各教派领袖，“已差金牌使臣前

往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定地界，汝当遣僧人同往”。派僧人参加清查户口、划定地界的工作，这显然是针对这一地区教派林立，寺院荫占人口的特点而制定的做法，目的在于避免因此引起不必要的惊惧和动乱。通过这次户口调查，蒙古统治者基本上摸清了乌斯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状况，这就为日后中央王朝在该地设置行政机构、驻军和建立驿站等奠定了基础。

蒙哥在乌斯藏地区的括户和分封，给各教派的宗教领袖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谋求将来的发展，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态度，转而采取积极争取中央王朝支持的立场。例如，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最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解决宗教领袖继承问题的加麻噶举派，在太宗派兵入藏时，其教主加麻八哈失避居擦绒寺，后又到川西一带去传教，一直对蒙古人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直到1253年他北上凉州、甘州一带活动，准备动身返回西藏时，蒙哥得知了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经过反复考虑，加麻八哈这才决计前往漠北，向蒙古汗廷传播西藏佛教，企图以宗教影响蒙古王室，通过蒙哥汗的支持来扩大加麻噶举派的权势。另一个最早隶属于窝阔台系阔端宗王的萨迦派，这时也从汗位转系中明显地感到形势对其不利。因为这时除萨迦派外，其余的几大宗教派别，如必里公、搽里八、伯木古鲁等，原来就直接隶属于拖雷系诸王。正是在认识到有与拖雷系诸王建立直接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后，萨迦派的新教主八思巴于1253年从凉州向东进发。这时正值旭烈兀率军西征，蒙哥远在漠北汗廷，无暇顾及西藏，只有奉命主持漠南军务，且正带兵南征大理的忽必烈有机会插手西藏政务。由于早在1251年夏，八思巴就曾经在六盘山与忽必烈有过初次会见，双方互有好感。这次为了与忽必烈建立直接的政治关系，八思巴决定从朵甘思赶来与忽必烈

再次会合。在太宗分封西藏中已得到搽里八派的忽必烈，这时也不以此为满足。八思巴的渊博学识和谦虚的美德早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所以当他听说八思巴主动前来投奔时，不禁欣然再次邀请八思巴前来相见。1254年他们再次在六盘山的会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将忽必烈与八思巴所建立的宗教、政治关系正式确定下来，而且还为八思巴日后成为统领全国释教的“国师”地位打下了基础。

在利用佛教僧人对西藏加强统治的同时，对于尚未完全臣服的吐蕃周边地区，蒙哥汗也继续使用武力进行征服。蒙哥即位后，命大将和里□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从种种迹象看，此次征进似不以西藏腹地为目标，而是为了配合攻宋，绕从四川西边，加强对宋蕃交界的各部落的进攻。这一行动意图，在忽必烈远征大理和统军攻蜀的都元帅太答儿、纽璘父子的军事活动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忽必烈自河西出兵，南征大理（行动路线详本节第四部分），必须穿越南宋四川两边的吐蕃地区，所以，在《元史》一些传记里，经常把这些将领的行动称为“从征吐蕃、云南”，或“从征吐蕃、云南、大理”。由于当地的吐蕃部落尚未臣服，故忽必烈军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元史》卷154《郑鼎传》记述，蒙古军“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敌据扼险要”，战斗自然是免不了的。另从南宋朝廷得到的战报证明，“敌犯岩州，恐逼黎、雅”，意图显然在于“取道入大理”，故下令四川边将“紧守关隘”。在忽必烈的大军逼境面前，有些吐蕃部落表示臣服，成为南征大理的向导。据南宋茂州官员报告：蒙古军“自曲纳族节节透入，已至渭节村、风节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蛮，长驱而往，则大理危矣”。

太答儿自蒙哥即位后，奉命统陕西西海、巩昌诸军攻蜀，重点偏在四川西边。1254年，“攻碉门、黎、雅等城”。但是，遭到宋军的坚决抵抗。1255年，随太答儿征蜀的蒙古将答术，曾领兵三千人救碉门，“大败宋军，斩首三百余级，俘百余人以归”。1258年，其子纽璘镇守成都，号令诸将，攻略川西，“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探马赤从纽璘征蜀，于同年（1258年）随万户昔力答略地碉门、黎、雅、吐蕃。昔力答死之。直至这年底，蒙古军“攻破雅州，石泉守将赵顺以城降”。至此，控制宋、蕃边界的大门才最后被蒙古军所占领。

总之，蒙哥即位后，通过清查西藏户口与实行分封，通过结交宗教上层与征服宋、蕃交界的吐蕃部落，最后保证了西藏地方有效地置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使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

4. 远征大理

1252年夏，忽必烈在曲先脑儿（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正南）入觐蒙哥汗时，受命帅师远征大理。据《史集》记载，此次出征本来是为了征服南宋王朝，但在忽必烈带兵出发后，他根据实际情况，向蒙哥提出要求，允许他先征服大理地区，“为军队取得粮食，然后再向南家思（南宋）前进”。这次出征，从东、西道诸王军队中每十人征集二人组成远征军，于1253年夏奉命出师。十二月渡黄河。1253年春，经盐州（今陕西定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驻六盘山，牧马养兵。八月至临洮，先期派往大理进行招降活动的蒙古使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带回了因道阻，招谕未成的消息。于是，忽必烈便指挥大军，从临洮出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转战川滇的历史大进军。九月，征滇大军进入吐蕃地区，到达忒刺（别译作塔拉，今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

省若尔盖县接壤之达拉沟)，分兵三路前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取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沿草原大道入吐蕃境内。忽必烈率中路军，循大渡河西岸草原南下，至满陀城（即宋盘陀寨，今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古城间），留辎重，次日过大渡河，经安宁河谷而南，“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于十一月进至金沙江。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取道宋边沿州县，进攻白蛮之地。大理国加强对北部边界的防御，屯军于金沙江沿线。由于兀良合台所率之西路军，首先取得摩些部落的支持，进入察罕章（今云南丽江），打乱了大理国的防御部署，使得大理相国高祥只得退兵大理都城，坚城固守。接着，中、东两路远征军也相继进入丽江地区。十二月十五日，在三路远征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略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大理，并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

蒙古军用武力平定云南，从政治上看，结束了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的分裂局面，对于促进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于推动云南地方经济的开发、文化的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军事上看，忽必烈平大理之役，还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行军路线，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南宋开辟了新的战场，使南宋王朝从此陷入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

大举攻宋

蒙哥即位以前，对宋战争的情况是：在太宗时期，蒙古军曾

经以急风暴雨的方式，从长江上游的巴蜀，陆续蹂践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开辟了巴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场。窝阔台死后，因汗位纷争，大位几度虚悬，蒙古无暇主动部署对宋的进攻，局面无大改观。蒙哥即位后，为了全面启动对宋作战，给即将发动的攻势作准备，首先在策略上作了两点改进：

第一，列障备边，即强调在临近南宋边境地区建立屯驻基地。如在巴蜀战场，继 1236 年蒙古军攻占兴元（今陕西汉中）后，1252 年春，蒙哥又派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在宋人废弃的沔州（今陕西略阳）筑城，次年又伸入蜀境，在利州（今四川广元）筑城，在白水（今白龙江）一线屯田，“欲为取蜀之计”。在荆襄战场，谋臣姚枢建议将“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以便“俟时大举”。蒙哥采纳这一建议，开始在汴京设置河南经略司，专门经略边境屯田、筑堡事宜。在两淮战场，蒙哥命张柔自杞县移镇亳州。由于“环亳皆水，非舟楫不达”。张柔为了沟通亳州至汴京城的粮道，又开筑甬路，筑堤一百二十里，修桥十五座，置堡二个戍守。与此同时，河南道经略杨惟中也在河南与两淮沿线大力屯田，使得屯田遍于“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在此基础上，张柔又遣部将张信屯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逼两淮。经过这番经略，蒙古军终于在西起巴蜀，中经穰、邓、襄阳，东连陈毫、清口、桃源一线，皆置重兵，列障据守。南宋理宗对此惊呼道：“近闻北骑之来，往往储糗粮，立寨栅，以为因利乘便之计。”

第二，迂回包抄，开辟自南而北，南北合兵夹击宋军的作战局面。蒙哥即位不久，即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充分发挥蒙古骑兵“长于用奇”的特点，采用“挟虚之计”，迂回于南宋的侧后方，“自临洮、吐蕃穿彻西南以平大理”。接着，蒙哥又命留驻云南的

兀良合台，“以便宜取道”，出兵北上，与留驻陕、蜀的“铁哥带儿兵合”，以便对南宋四川实行夹击。兀良合台于1255年秋移师攻蜀，“遂出乌蒙，趋泸江，铲秃刺蛮三城，却宋将张都统兵三万，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斩获不可胜计。遂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济蜀江，与铁哥带儿会”。按“铁哥带儿”，即留驻陕、蜀的蒙古都元帅帖哥火鲁赤与太答儿。兀良合台与铁哥带儿南北两支蒙古军在四川内地会师的过程，前后持续了半年之久，直至1256年初才相继撤退。这一南北夹击，“腹背交侵”的战法，使南宋四川从此陷入“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受敌，咽喉中梗”的困难境地。

1256年，蒙哥在蒙古地区中部的哈不儿哈不黑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召集诸王百官，商定举攻宋之计。诸王移相哥（亦孙哥）、驸马帖里干等一批蒙古贵族，首先积极主张出兵攻宋，并且质问说：宋朝距我们这么近，“并与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置之不理，拖着不去出征彼国呢？”鉴于当时蒙、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蒙古统治者已经在三个战场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急于建立功业的蒙哥汗，出自于想要超过父、祖辈的功业，和与日益在汉地崛起的御弟忽必烈争夺对中原控制的动机，决定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并且确定“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

蒙哥汗制定和实施的是一个以进逼临安，灭亡南宋政权为目标的全面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蒙古军将在三个战场、大江南北两条战线，分五路展开行动：（一）命诸王塔察儿率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牵制淮西的宋将；（二）命益都行省李璫率军进攻海州、涟水，牵制淮东的宋军；（三）命大将兀良合台率军从大理进攻广西，预定和蒙哥汗在潭州会师；（四）命大将张柔从忽必烈征鄂州，然后顺流东下，进逼南宋都城临安；（五）蒙哥

汗亲自率军向四川发动进攻。

1257年，蒙哥亲征南宋，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土。1258年夏，蒙哥驻蹕六盘山，聚兵进攻四川。应召从征的有：诸王穆哥（亦作末哥、莫哥）、莫哥都，驸马君不花，以及蒙古、畏兀儿等族部将，还有来自北方四大汉将，即史天泽、张柔、董俊、严实所统的军马，原来留在蜀中征战的蒙古、汉军，还有四个系统：由汪德臣所率的利州戍守部队；由刘黑马所率的成都戍守部队；由按竺迺子彻里、国宝所率的阶州、沔州戍军；由都元帅纽璘、诸王阿卜干所率的驻守成都的蒙古军二万，号称十万。当时，从驾征蜀的蒙古、汉军，兵强马壮，力量雄厚。由蒙哥亲自统领的征蜀军数为四万，号称十万。加上留在蜀中四支兵马在内，估计这次征蜀的蒙古、汉军的总兵力有七万人左右。

七月，蒙哥留辎重于六盘山，命大将浑都海守之，亲自督师入陇州（今陕西陇县），经宝鸡入大散关，另遣诸王穆哥从洋州（今陕西洋县）出发，越米仓山捣巴州（今四川巴中），沿渠江流域以进；命万户孛里叉从鱼关进至沔州，沿嘉陵江向南进兵。为配合蒙哥的征蜀行动，纽璘率一万五千蒙古、汉军，战舰二百艘，从成都南下，取道叙、泸，抢渡马湖江，直奔重庆下游江面，以杜绝南宋从荆湖增援。

九月，蒙哥至汉中，随即取金牛道向四川进发。十月，入利州城，在蒙古戍军守将汪德臣的导引下，渡嘉陵、白水二江，取苦竹隘（今剑阁县西北），“夷其城”。十一月，拔长宁山城（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降大获城（今苍溪县东南）。十二月，南宋运山（今蓬安县东南）、青居（今南充市南）、大良（今广安县东北）诸城守将投降。据无人不完全的统计，在蒙哥初入四川的前两个月中，共攻拔了“龙、剑、阆、蓬、巴、达、果、

渠、长宁、大安（良）诸城”。

己未（1259年）正月，蒙哥汗驻蹕重贵山北，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商讨进一步攻宋方略。蒙哥以蒙古军“今在宋境，夏暑且至”，就是否继续征战征询诸王、驸马、百官意见。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撤退。如脱欢说：“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另一种主张继续进军。在如何进军问题上，有人认为，鉴于“蜀地岩险”，宋军固守重庆、合州二城，不如留下一军牵制，置城于不攻，大军“水陆东下”，出荆楚，与渡江之师会合，“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立无援，不降即走矣”。另外的人则把这种见解视为“迂阔”，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主张乘胜进攻阻挡大军前进的坚城钓鱼城。在当时恃强好胜，邀功心切的战将的要求支持下，蒙哥汗决定将全军留在宋境，不惜以武力征服钓鱼城，以扫除进军的障碍。

钓鱼城（今合川县东）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会之冲，是南宋王朝经过近二十年（1240—1259年）精心构建的一个屏障重庆、守御巴蜀的防御要点。在当年蜀帅余玠领导修建的山城防御体系中，钓鱼城就包含了“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的战略意图。因此，当蒙哥督诸军进攻此城时，守将王坚即指挥守军利用钓鱼山的天然良险，多次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二月至四月，蒙古军屡攻不克。五月，蒙古军由于水土不服，将士染疾，“军中大疫”，士气大为低落。六月，前锋将汪德臣选锐卒乘夜进攻外城马军寨，强攻山城，王坚率兵英勇抵抗。时值大雨，攻城梯折，后军因失利撤退。汪德臣负伤，未几死去。

七月，南宋朝廷派来增援的吕文德军，在突破蒙古军设在长江和嘉陵江的层层防线后，溯江而上，进至合州东南的黑石峡。